
近代上海“自由贸易”的历史审视： 制度、形态及多重效应

【摘要】：近代上海经济的百年发展是个奇观，在贸易条件长期不利状况下，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其商业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莫不与“被迫的”“自由贸易”形态相关。从开埠初期的区位优势，至清末民初的规模优势，再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制度优势，是近代上海经济转型的三次递进，有效的市场化是贯穿其中的内在逻辑。以历史的高度审视近代上海外贸的利弊得失，对于现今的自由贸易，具有鉴往资今的意义。

【关键词】：近代上海，“自由贸易”，市场化，口岸工业化，历史审视

近代上海外贸，晚清开埠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叶关税改革的相当长历史阶段中，因协定关税税率甚低，加上条约口岸、洋关制度及租界等因素，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类似“自由贸易”的形态，包括中外贸易自由、金融自由、1895 年后的制造自由。在类似“自由贸易”条件下，上海集聚国内外各种资源要素，城市经济不断转型，迅速由一个原来“东南壮县”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

“自由贸易”及区位优势所形塑的大规模市场的兴起，构成了沪地经济持续发展的内驱力。以港兴商，以商兴市是近代上海发展变迁的基本路径。我们在认知近代“自由贸易”对经济转型巨大形塑力的时候，须对近代上海这个“通商巨埠”的制度、形态、效应之利弊得失进行客观辨析和历史检讨，以此观照我们今天的自由贸易，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一、条约制度下的“自由贸易”

近代中国的“自由贸易”制度，是西方列强运用“坚船利炮”的国家军事力量，通过一系列对华战争，以条约制度的形式强加于中国的。

明清两朝长时期实行“闭关锁国”有限贸易的对外政策。明代初期至嘉靖年间约 200 年厉行海禁，隆庆以后（1567 年）到崇祯后期年（1641）年的 74 年时开时闭。海禁时间远大于开禁时间。清代前中期约 200 年间，约五分之一时间基本开放，乾隆 22 年至道光 20 年（1757—1840）鸦片战争爆发的 84 年间则实行一口通商（广州）的“半闭关”政策。鸦片战争前的广州一口通商，外商与华贸易以均须由“官牙”十三行代理进行居间贸易，十三行对外商的活动进行严格监管，外商不能直接与华商交易，甚至不得与华人交往，“免其外出滋事”^①。工业革命成功后的英国亟需“无限制地销售…工业品——棉纺织品、毛织品、刀剑品——的广大而有利的市场”^②，打开中国市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状况，于是发动了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称之为商业战争）前夕，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拟定了为解决两国争执问题的各项条款，“自由贸易”是最主要内容：“英国臣民，不论男女，应准许自由和不受限制地居住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口岸，这些口岸应在条约中明白开列；英国臣民应准许同任何愿意和他们做买卖的人进行交易；他们在交易上不限定于任何“行”或“会”^③；一切垄断制度应即取消，应有合理条件下的买卖自由；英国人得自行管理他们的事物，“而不受以掮客，经理人，代理人，翻译，通事，或买办的雇佣”强加于他们的拘束；也应有选择他们私人仆役的自由；应有一个公平正规的税则，所有各口岸统一施行^④。鸦片战争后，有关的“自由贸易”制度由列强主导和制定，其主要制度文本来自于条约制度的相关条款。

近代条约制度肇始于 1842 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至 1876 年的（中英）《烟台条约》，清廷与列强签订了二十余个条约。到 19 世纪 70 年代近代条约制度体系基本确立。其一，列强在华的主要特权已经确立，其二，清政府改变了对条约的敷衍态度，朝廷出现了一批力主与外交好的洋务派官员，使条约权利的落实得到保障。

条约制度是由一系列条约、协定、规章等构成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清廷与列强各国签订并批准的正式条约和各种协定、章程、条款、照会等。2. 中外正式条约以外的各种章程、协定、合同等。3. 中国政府为了履行条约及办理相关事务，颁布的相关法令、章程及谕旨等。4. 列强根据条约法权在中国建立的组织机构及其相应制度。至 19 世纪 70—80 年代，英法美等列强攫取的主要特权有通商口岸和租界地、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自由雇募、海关事权、内河航运、鸦片贸易、苦力贸易及传教权等。这些早期条约内涵，大多是围绕着西方列强的“自由贸易”这一中心设置，一类是为列强扩展和推进对华市场服务的直接的贸易经济方面的制度，一类是为“自由贸易”提供间接服务的司法、社会、文化等方面制度。在条约体制下，上海地方政府与外国领事为条约落实签定不少地方性的协定和细则。由于沪地外国势力的集中和强大，列强时常超越既定条约攫取不少额外权利，上海成为条约制度实施密度、强度最高的地方。1895 年甲午战争后的《中日马关条约》，列强又获得了自由设厂制造的权力，“自由贸易”进一步深化为自由投资；上海成为外资抢滩之地。

与近代“自由贸易”相关度甚高的主要有四项不平等制度：协定关税制度、洋关制度、片面最惠国待遇和租界制度。

1842 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和 1843 年《中英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关税由中英共同协定，不得随意修改，协定关税税率相当于值百抽五。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洋货运销内地子口税即国内关税为值百抽 2.5%。中国几乎成为没有关税保护的國家。清末，清廷与列强就“加税免厘”问题进行多次交涉。1902 年 9 月《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签定，确定进口商品税率不超过 12.5%，出口土货税率不超过 7.5%，但终清一代加税裁厘并未实行。晚清，当时为了征收方便，大部分商品采用从量税率。1858 年后，随着物价稳步上涨，实际税率平均不到 3%，即使在修订后的最初几年里，实际税率从未超过 4%。^④

近代上海的“自由贸易”制度与现今的自由贸易制度不同在于，前者是协定关税，后者为免征关税。近代中国的协定关税，对于西方列强而言，因进出口关税率极低，近乎于“自由贸易”的零关税。开埠后十年，英法等国乘小刀会起义之际，逼迫上海道台吴建彰于 1854 年 6 月 29 日与英、法、美三国领事签订中国海关“聘用”外国人的《江海关税规则》九条。这个规则允诺三国领事各选派一名外籍税务司由道台“聘用”；“除非各国领事同意或制度有根本改变，不得免除税务司职务。”^⑤税务司成为外国领事的一个“附属机关”。英国等列强有效地控制了江海关，近代中国的“洋关制度”由此肇始，“是同单边的《协定关税》相表里的，也是它的执行者。”^⑥咸丰三年，英国等列强攫取江海关和中国总税务司事权后，上海等口岸的实际进出口关税低于 5%。“江海关有些措施，暗中先采纳上海英商公会的意见。”^⑦海关，本是一个国家控制外贸的主管机构，列强掌握近代中国海关事权的实际效应是——外商获得了远比免税更大的“贸易自由”。

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实施，使所有缔约国都得以享受任何一个条约所规定的“商业特权”，列强特权具有乘法效应，同时放大了中国权益的损失规模，美、德、日等后起的列强借此迅速扩展了其对中国的经济渗透。一国之特权，诸列强一体均沾，而若改变或废止特权，则中国往往必须逐一交涉谈判，极大地增加了近代中国收复国家正当权益的难度；如将协定关税改为国定关税的关税改革，就因日本的刁难和反对一再拖延。

上海近代租界，最初设立之意即为外人贸易居住区，后“不得谓为特权的给与，然而限制无效，抑且变质，终于形成国际间一种最畸形的制度。”^⑧列强开辟租界的目的在于攫取“保证贸易的政治权利”^⑨，便于其不受中国政府干预地进行自由贸易。

撇开列强的政治目的，租界类似今之自贸区。上海自贸区（试验区）第一次批建 28.78 平方公里（第 2 次批建扩大至 120.72 平方公里），近代上海的租界约 31 平方公里（公共租界，自 1899 年占地 32110 中亩，约合 21.42 平方公里，法租界 1900 年 2135 亩，1915 年越界筑路达，法租界公董局管理所及面积达 1015 万平方米，即 10 平方公里^⑩），比第 1 次批建的上海自贸区面积稍大。凭借着列强地位，租界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效应溢出边界，整个上海（包括华界）皆为其势力所染，成为事实

上的“自由贸易”区。洋行等外资机构或兼营或投资中国的航运、金融、保险、出口加工业，在租界内投资于上海的码头、仓库、房地产、城市公共事业等。

租界的开辟有利于英国等列强在沪自由贸易，更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沪自由投资。1843—1949年间，上海有2748家外商企业，涉及国籍35个^①。近代上海外资企业，除了少数工业企业外，外商进出口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公用事业、娱乐业、新闻业、外贸加工业、航运业、房地产业等绝大多丛集于租界内^②。

开埠后，大规模国际贸易兴起，出现了许多制度真空，大量的西式商务、贸易制度引进；许多制度由民间自发演进而来。关税低下，无有限额，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可谓贸易自由度极高。外商在口岸租界自由投资，中国政府无权过问，近代上海自由贸易无负面清单制度，更谈不上审批，监管。此后，列强在其整个势力范围内自由交易、自由投资、自由制造，经济渗透不断深化。自由贸易中的负面清单的制度，标示了国家贸易主权的存在。负面清单非越少越好，而是适当地规范、监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树立健康的市场秩序。严格监管与有效的市场机制是相辅相成的。市场发展到哪里，监管应同时延伸至哪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近代上海的“自由贸易”没有负面清单制度，实际上意味着，国际贸易没有门槛，没有禁止领域，是个不设防的自由交易市场。在这样的国际贸易形态中许多“游戏规则”由列强主导，甚至有些与外贸相关的国内交易因历史原因，形成外商组织某些特权，后起之华商企业不得已遵从惯例。民国上海糖商业，其经营食糖大半是进口糖。糖业“在中国进口行定单上，有一奇异之条件。即糖行与进口行如发生争执，须请英商公会派出公证人调解，夫双方同属华商何必英商公会之人为公证人，理不可解。据进口行中人言，糖行若对于所定之糖，发生异议，进口行必根据糖行之理由，向海外糖厂交涉，而海外糖厂遵从英国经商习惯，其它国商业习惯均无效力，故糖行进口行发生争执时，必请英商公会之人为公证人云”^③。尽管有上海华商的糖商业同业公会，但对涉及进口糖业务纠纷，即使双方均为华商也只能由外商公会调解。这种“游戏规则”显示了近代上海外商对于市场秩序的某些制导权；而华商行业组织也无奈认可这一制度，出现“自由贸易”中华商并“不自由”的制度形态。

自由贸易区的功能主要在于金融、货物流转、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及便利，而近代上海在这些方面的优利条件主要蕴涵于条约口岸的开放市场中，虽具体的自由贸易制度不甚明确，但整体市场交易自由化程度极高，因制度的主导权操于列强之手，各国对华进出口贸易的优利条件十分突出。中国成为列欧美各国的商品销售市场、资本输出市场及原料采购市场。

二、长期对外贸易逆差，外贸条件趋于恶化

上海开埠后，19世纪50年代以降，进出口总值超过广州，一跃为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自有正规的海关统计以来（1867），上海口岸的外贸平衡就呈现出逆差状况；随着外贸量的增长，进出口贸易逆差波浪式扩大。

表 1

近代上海对外贸易平衡状况(1867—1935)

(1933 年前海关两, 1933—1935 法币, 单位 1000)

年份	上海进口	上海出口	贸易平衡	备注
1867	41805	26237	-15568	此为正规海关统计起始年份
1870	46355	31753	-14682	
1875	45862	30808	-15054	
1880	56046	36179	-19867	
1885	59416	27655	-31761	
1890	66251	32742	-33509	
1895	98640	70200	-28440	
1900	125990	78139	-47851	
1905	258381	107962	-150419	
1910	198286	175672	-22614	
1915	198214	201438	32240	
1920	383918	193795	-190123	
1925	431888	306185	-125703	
1930	679742	312668	-367074	
1935	507695	288974	-218721	

(为了节约篇幅,本表以逢五逢十年代记录,一些年份因代表性问题略作调整。资料来源主要为近代历年《海关贸易统计报告》,并参考某些重要资料,综合编制。)

从上表中可见,近代上海进出口状况绝大部分年份为逆差,由同光年间的逆差一二千万关两,到 19 世纪末的三四千万关两,至 1905 年已达 1.5 亿关两;晚清时期,上海贸易逆差年份多于全国水平^④。民国以降逆差继续扩大,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外贸逆差高达三亿多关两。伴随着外贸逆差的上升,上海口岸外贸条件趋于恶化。

外贸条件(Term of Trade)表示一定时期内,某一经济体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之间的对应关系,可抽象为一种指数,即单位出口量所能换回的进口量或单位进口量所需要的出口量,其公式表示为外贸条件= $(P_x/P_m) \times 100\%$ 。P_x 为出口商品价格指数,P_m 为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两者基数相同),如果出口商品平均价格上升,P_x/P_m 值变大,外贸条件改善,反之变小,外贸条件恶化。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考察发现,19 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对制成品比价呈下降趋势,即非工业化国家外贸条件渐趋恶化。以一个既定数量初级产品可交换的制成品数量,1876—1880 年指数为 100,1901—1905 年降为 84.6,1921—1925 年下落至 67.3,1931—1935 年仅为 62.0^⑤。中国外贸史专家的研究表明^⑥,中国外贸物价指数由 1871—1875 年间的 145.3,逐波走低,1895 年后下降幅度增大。1931—1935 年外贸条件指数值 77.8 仅为 1876—1880 年的 49.4%,55 年间下降了一半余,既购买相同数量外国进口工业品,需多输出一倍以上的出口初级产品,此已超过拉美初级品比价的下跌幅度。以 20 世纪初的三十年世界市场和中国经济变迁情势考察,中国外贸条件渐趋恶化具有一定必然性。

表 2

中国近代进出口物价指数变动(5 年平均)

1913 = 100

年份	(出口物价指数) P_x	(进口物价指数) P_m	$P_x/P_m \times \%$
1871—1875	53.8	37.3	145.3
1876—1880	48.9	31.1	157.5
1881—1885	42.3	33.0	128.1
1886—1890	56.3	37.3	151.0
1891—1895	59.0	41.7	142.0
1896—1900	74.9	62.1	120.7
1901—1905	89.9	78.7	114.5
1906—1910	92.9	90.1	104.4
1911—1915	98.7	104.8	94.1
1916—1920	114.8	145.3	78.7
1921—1925	133.1	152.5	87.7
1926—1930	163.3	160.9	99.6
1931—1935	130.4	167.2	77.8

资料来源:陈争平“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条件刍议”,《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 论文集》,新亚研究所(香港)1999 年出版,第 218 页。

第一,中国外贸规模扩大导致贸易条件趋于不利。一般而言,小国外贸值较小,其贸易不会引起世界市场价格较大波动,大国则不然,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扩大都会引起国际供求关系变化,导致不利状况发生。政治经济强势之大国可以利用其强力干预国际市场,维护本国利益,而落后国家则只能是国际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丝茶国际定价权失落后,中国最重要的资源优势丧失,中国出口贸易面临着一个无限弹性的需求和供给函数,丝茶大国——中国沦为世界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的无奈接受者。开埠后,西方物质生活方式的扩散和城乡消费的早熟,进口工业日用品需求持续增长。20 世纪后欧美化新产品层出不穷,进口货价不断上升,催动着贸易条件不利转化。清末民初,外贸总值迅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外贸条件加速恶化。

第二,近代国内外劳动力成本差距,总体趋于扩大,使进口工业品价格下降空间被压缩。20 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商品市场和劳工市场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于生产集中,商品市场形成垄断,另一方面因工会强大和工人斗争使劳动者工资增加。由此西方国家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生产效益主要转化为垄断利润和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反观中国,随着自然经济日益解体,出现了劳动力供给无限扩大的态势,城乡雇佣工人及手工业者工资、收入都呈下降态势。此外由于华资厂商、出口商间的无序竞争,出口商品价格往往被压低。进出口货物价格的反向变动导致外贸条件恶化。

第三,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导致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中国出口商品以农副产品及初级产品为主。民国年间虽有部分工业品出口,比重甚小,甚至由于国内制成品需求扩大,中国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总体有所下降。民初(1913 年)中国出口商品中制成品、半制成品与原料的比例为 50.9:29.1,比值为 1.7,1936 年,制成品(包括半制成品)与原料比例为 39.5:35.8,比值为 1.1^⑨,比值下降了 0.6。原料、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即使价格下降也难以使需求有较大增加,反之经济发展使资本品、工业品制成品的需求弹性扩大引起价格上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区及内地城市消费风气变化,民众消费洋货成为时尚,进口日用百货及奢侈品规模、种类均有增长,进口逆差随之日趋扩大。

第四,近代中国商流物流的口岸化流通网络,使进出口工农业产品形成国内的不合理定价,助长了外贸条件恶化。进口货物定价,一般以口岸洋行批发价为基价,然后在流通环节中各种费税、商业利润及运输费用等层层加码形成市场价格。出口商品则以口岸市场价为基价,在不断集中的商品流通环节中层层减价,甚至低于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口岸化市场的价格制导体系无法制约进口货物的高价格,却迫使出口农副产品在国际市场价格以下收购及流通。

第五,近代中国汇率持续下落对外贸条件的负面影响。近代中国,1933 年法币改革前实行银本位制,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先后改为金本位制。19 世纪中叶以来金贵银贱,金银比价波浪式上升。金银比价 1870 年为 15.57,1900 年升为

33.33, 1930 年上升至 53.38, 1932 年达 73.50^⑧。由此中国银汇逐节盘跌, 以美元为例, 1871 年 1 海关两折 1.58 美元, 1900 年下折为 0.75 美元, 1930 年下折为 0.46 美元, 1933 年下折为 0.26 美元^⑨。白银贬值为外贸条件恶化又一重要原因。

第六, 初级产品的替代和节约使中国出口需求减少。新的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使新材料不断出现, 如人造丝的出现, 使生丝的需求减少, 生丝的世界竞争使中国生丝的价格跌落, 另外, 由于人造丝的价廉, 导致国内需求产生并不断增加, 反而引起进口扩大。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西方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世界经济进入电化时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均有所发展, 但不平衡加剧, 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快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 更快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 落后国家受到先进国家经济的全方位影响, 世界贸易变迁进一步有利于发达国家。当世界少数国家发达先进, 大多数国家贫穷落后, 且两者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相当大时, 先进的工业品为前者相对垄断, 而初级的农副产品、矿产品、原材料等则在后者之间分散竞争, 贸易利润不断向新技术产品凝聚。

三、“自由贸易”对民族工业的多元作用

世界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兴起, 有一个物质前提: 大规模市场的存在。在国内统一市场尚未形成或国内购买力有限的情况下, 这一“角色”是大致由国际市场充任。中国近代经济变革源自外力冲击, 具体地说就是海外国际市场的冲击, 由此引起各地自然经济解体 and 口岸地区市场经济的兴起。近代世界经济格局中, 落后国家的早期发展, 最有效之路径在于与发达国家的交往, 由此获取先进的物质生产力和先进的制度资源。

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兴起有两条重要路径。其一是国家投资的近代工业, 包括晚清时期的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和民国政府设立一些近代工矿企业; 其二是民间资本兴办的大量轻纺、食品工业、机器修造等企业。私人资本的近代工业企业在数量上, 远甚于国家资本企业。近代中国的贸易开放对民族工业的颇有些正面作用, 择其大端论之有三点: 其一, 瓦解了顽固的自然经济, 释放了工业化发展的生产要素。其二, 引进中国早期现代化所需要的先进生产力和国外资源。其三, 引进了先进的制度规范和价值理念。

近代上海民族工业丛集, 可谓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半壁江山, 及其利弊得失, 与上海近代通商巨埠的地位密切相关。以“自由贸易”形态的市场视角论之, 近代上海民族工业的发展具有三个其他地方所不及的特殊因素; 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条件。

第一, 占据“进口替代”的有利市场地位

开埠后, 机制品市场不断扩张, 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进口替代”对民族工业及其产品具有强劲的市场牵引力。

传统社会商品流通的局限性或曰落后性, 在于大部分商品流通的分散性和封闭性。开埠后市场空间开拓的意义, 不仅在于数量规模的扩大, 更重要意义在于市场空间排列的相对集中和商品流通方式的变化。简单的商品经济自古就有, 大规模、专门化、对社会生产具有重大影响的市场交易产生于世界贸易。19 世纪中叶后航运费的递减, 进口机制布和机制棉纱的价格拾阶而下。如本色市布, 1867 年每匹(7 磅)为 2.12 关两, 1876 年以后为 1.19 关两。^⑩六七十年代进口洋布廉价的优势已经显示出来, 八九十年代机制布比之土布的价格优势进一步扩大。上海生产的土布的价格比大致同类的进口布一般要贵 50% 以上, 价格差最大者达 115%。洋布普遍渗入东南地区和长江流域乡镇, 机制布市场加速扩散。同治末年起, 上海的《申报》就频发文章, 主张“中国应从欧美进口纺织机, 以本国棉花为原料生产洋布仿制品”; “兹所织成之布, 不但可供本国之用, 而且尚能有余, 贩卖中国之南省。其获利谅亦不鲜奚。”⁽²¹⁾ 机器纺织之利在八九十年代已清晰地凸现出来了, 这种市场“之利”在 1895 年清廷解禁后, 终于演化出了“机厂如林”的景象。大流量的集中化的持续化的市场空间才能真正为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提供发展条件，才能突破小生产的窠臼，引起生产的创新和生产组织、生产关系的变革。当进口商品市场容量达到一定规模时，由于生产成本的差异就会引发进口替代，在洋货扩张条件下中国口岸地区仿洋制品工业先后发生。

开埠后，由外贸吞吐及转运的商品流量迅速扩展，且商品流通汇集于口岸，尤其是上海口岸呈现出高度集中化的态势，单位面积市场密度大大提升。上海为中国最大的外国工业品输入港，清末民初已形成了内外贸易一体化的商品流通体系，具有其他口岸无法比拟的市场流量，上海率先形成了规模化生产的市场空间，于是进口替代型民族工业在沪兴起。

近代进口商品结构变迁，进口替代型的民族工业也随之进化。晚清机制棉货是进口大宗，清末民初民族棉纺织工业兴起。民国时期各类日用化工、家用电器、轻工业品进口增加，上海同类民族工业也渐次兴起，成为全国新兴民族工业的领先者。

第二，便于获取国外生产资料供给

近代中国作为落后的农业国，近代工业产生的物质前提只能是从国外引进新的生产力，具体地说就是从国际市场购买先进机器设备等现代化的生产资料。这种现代化生产手段的外来性形成了特定的市场关系，在生产资料等供给上，上海明显具有内疏外密的市场特点。作为最大口岸，上海在机械设备、紧缺原料等方面的国外供给上占有十分有利的地位。

1873年，江海关虽将机械进口列为单项统计，并无机械分类计值。1894年，上海机械进口额为104.9万关两⁽²²⁾，占全国同类进口总值（112万关两）的93.66%。民国后，机器进口值持续增长。1913—1936年间，上海机械进口占全国的比重平均为43.6%，最低为33.141%，最高为60.86%。1914年后海关机械进口分类统计，上海机器进口与现代工业发展的关系较前清晰。1931年，上海分类机器进口在全国的比重：印刷造纸机为86.27%，纺织机为79.92%，动力机64.67%，工作母机为61.60%，缝纫针织机为59.91%，各式电机为58.23%，农业机械为55.47%，其他机器为42.04%⁽²³⁾。上海各类机器设备进口比重均相当高，绝大部分比重在50%以上。上海最大机械进口港的地位，刺激了本地机器生产工业的兴起。

上海口岸这一特点为近代民族工业兴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近代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对进口机械的需求，使之成为中国最大的机器机械市场。机器设备输入及外资厂的示范作用，成为使用机器设备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工业兴起的一大诱导因素。晚清，铁路、公路交通极其落后，机械设备运输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投资者大多就近口岸建厂，况且上海作为内外贸易中心，资金、劳力、原料及销售等条件均较有利。民国以后，上海城市的综合经济条件更为优越，考虑到房地产价格，近代工业企业也大都尽可能地靠近沪城或近郊建立。

原料是另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工业生产的“粮食”。如果将机器设备作为企业的固定投资，那么原料则是企业生产的日常“粮食”，其供给方式，供给价格，供给质量等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上海近代工业主体为轻纺食品工业，原料大宗是农产品。中国系农业大国，各类农产品供给似乎无大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作物品种陈旧，农产品原料在数量、质量上均不能满足近代工业发展需要。清末民初，上海近代工业初兴时，轻纺业原料主要由国内供给。随着国外原料渐次输入，质优且价不贵（洋棉、洋麦、美烟叶等）的洋货原料逐步增加，沪地工业原料构成发生变化。20世纪二三十年国内政局动荡，农业灾害频发，洋货原料比重迅速上升，“上海工业颇有偏向输入原料之趋势”。⁽²⁴⁾以往学者诟病为上海近代工业脱离原料产地，空间分布不合理。其实，上海工业并未完全脱离原料产地，进口原料的“产地”正是口岸地区。一个城市的经济不可能长期违背经济规律而持续发展。上海工业原料的“多元化”是国内外生产条件、资源禀赋差异及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之所致。近代中国人力成本低廉，生产成本中原料比重甚大⁽²⁵⁾，在“比较利益”法则下，采用进口原料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质量、增加竞争力，完全符合市场价值规律。从历史视角看，不是什么其他因素，正是“市场强制”确定了上海近代工业原料结构变化的态势。上海区域位置的优越凸现为即便于得到国内原料，又便于获取进口原料，两者可以互济余缺。“上海凭借其地理位置控制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业基本原料，这些原料的来源是稳定的”⁽²⁶⁾。一定意义上说，地处口岸就是一种宝贵的经济资源。

第三，形成了国内竞争国际化的市场环境

近代上海工业品供给是个多块拼合结构：进口外货、在华外资企业产品、民族工业产品，民族工业产品又分为机器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两类。这样的市场关系和竞争形态发轫于清末，贯穿于整个民国年间的上海经济发展过程，是上海民族工业生长发展中难以回避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关系。

市场开放及竞争是现代化经济的基本特征。近代上海作为商业巨埠，国内外市场彼此渗透密切相联，市场竞争国际化成为上海早期现代经济的一种“天赐”条件。在这样开放性市场环境中，中外企业施展身手，各居不同地位，各享不同商机，也承受各自压力。市场发育促进企业竞争，企业竞争推进、深化市场变革，从竞争角度而言，竞争范围大小与竞争水平的高低成正比，也与现代经济进化程度成正比。

市场竞争多元化、国际化使市场定价机制、要素配置功能得到充分发挥。马关条约“解禁”后，列强资本输出兴起，随之华商进口替代工业崛起。民族资本进口替代型企业市场牵引下，凭借本土制造低成本等若干优势建立起来，其产生壮大既是市场竞争有效化的产物。清末中国各式仿洋机制品兴起，火柴、棉纺织、面粉、卷烟、肥皂等民族资本工厂相继建立。民国随着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上海出现了一批新型进口替代工业，如二十年代的毛纺织业、搪瓷业、化妆品业、电灯制造业、橡胶业、水泥制造业、电扇制造业等；三十年代的机电制造业、化工原料业、铅笔制造业、无线电业等。在多元化竞争中，新兴商品市场不断形成拓展，沪上民族工业产业结构不断变迁和进化，三十年代中叶上海民族替代工业达到了相当规模，取得了进口替代的可观成效。

近代民族企业在价格、技术、营销和企业管理等方面与进口洋货、在华外资企业产品进行着全方位的竞争。能在市场上立足并发展起来的民族企业，其产品质量、营销价格或附加特点大都优于别人，如荣家企业的“钟人”牌棉纱、“绿兵船”牌面粉，五洲制皂厂的“固本”牌、“五洲”牌肥皂等名牌产品闻名遐迩，享誉市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进入垄断竞争阶段。清末以来进入上海的外资企业大都是国外垄断资本集团，如英美烟公司、（英资）中国肥皂公司、（日资）内外棉公司等。其庞大的规模对华资企业形成了巨大市场压力和资本压力。在这些外资企业竞争压力下，沪地民族资本企业加快了资本集中的步伐，甚至出现了过度扩展，追求公司集团化的倾向。为了与国外大公司和在华外资企业竞争，一部分民族企业变革改制走向成熟，企业素质不断提高。在洋货竞争压力相对较轻的行业，华商中小企业大量存在，利用手工生产低成本优势立足于市，顽强生长。沪地中外企业丛集，构成了相对完全的市场竞争，使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地发挥。因循守旧，经营无方的厂商遭到市场无情摒弃，在市场角逐中能够发展壮大的都是那些素质上乘的先进企业。去芜存菁，在国际化竞争中保留了民族企业的“强种”，上海民族工业的发展水平和经营策略在市场“淬砺”中不断提升，涌现一批素质优良的华商企业和驰名海内外之明星产品。

在竞争中上海实业界逐渐形成了“坚韧勤勉，务实创新”的经营理念。国际化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大提升了企业生存发展的“标准线”，上海实业界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博取信息，开阔眼界，“敢于引进，善于鉴别”成为华商企业家的一个优良品质。许多先进产品、新式行业往往首先出现在上海，许多新技艺、新款式也由沪地发其端，传播于内地。近代上海民族工业企业综合素质相对其他地区要高，与其说体现在生产设备上，不如说体现在企业机制对市场竞争的承受及应对能力上，体现在经营者日益生长的企业家精神上。

第四，外贸形态对民族工业的制约

中国民族工业大半集中于上海为中心的口岸地区，其路径特征是进口替代型，市场特征为与进口洋货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海关事权旁落、关税奇低、外货流通税收优惠，外国商品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城乡市场，进口工业品实际上成为中国总供给的重要部分。上海民族棉纺工业兴起于清末民初，一大战时获得了高额利润，战后不久呈现衰退之兆。二十年代上叶上海等

地华商棉纺业的萧条，表面看是棉花价格上涨的原料问题，实质上是“自由贸易”形态下，民族工业不利地位的显现。世界工业发展史显示，工业生产的相对效率、相对成本与该产品的生产历史有关，累计产量越高，生产效率越高，单位成本也越低。落后国家近代工业起步晚，在开始进行工业生产时，其生产效率较低而生产成本较高，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处于不利的地位。上海近代“自由贸易”体制下，这种不利地位十分突出。由于缺乏贸易主权，民族工业在遭遇市场畸变时，往往难以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即使施行一些行业性措施也很难奏效。二十年代初由于“花贵纱贱”，民族棉纺业利润直线下降。据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档案显示，1922年、1923年，纱联会多次召开紧急大会，规定棉纱每包最低价，并公决会员企业停工减产，⁽²⁷⁾以此减少棉花的需求和棉纱的供给，稳定花纱市况。但这些行业化举措并未见效，华纱减产出现的市场空缺，为进口外纱和在华日资纱厂产品填补，棉纱价格继续下跌。缘于市场持续恶化，这一时期上海等地许多民族棉纺业企业破产倒闭，或被拍卖。压缩产量的市场化措施如此不堪一击，极重要的因素在于“自由贸易”体制下，国内外市场绾结一体，市场平衡溢出民族市场边界，在华日纱和进口棉纱的市场优势无法防范。华商棉纺业的正常成长期只有20年左右，二十年代上叶、三十年代上叶出现了两次行业性深度萧条。从民国上海工业结构转换的投资来源看，仪器、电化、冶金等新兴工业的初始资本极少来自棉纺织业的积累。上海近代工业结构转化停滞不前，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民族棉纺业对工业化资本积累的贡献甚小，没有为后一轮新型产业进行资本准备的功绩。

落后国家现代工业起步时，由于其技术水平差距和人力成本低下，以替代工业方式启动国内工业化是可行之路。人口规模庞大的落后国家，在外部经济水平不平衡条件下，依托潜在国内市场，充分利用国内资源，扩大农产品出口，增强农民经济力量，提升农村有效消费水平；同时摒弃外国竞争性商品，让国产工业品占领广大农场市场，使农产品输出获得的国际剩余转移至工业，促进本土工业化发展。这种发展形态有助于农业大国的工业化进程。近代中国这样的形态始终没有形成。列强主导的自由贸易及关税主权丧失，国内工业品市场大半为进口洋货和外资企业产品占据，民族工业通过市场积累获取农业剩余的方式受到严重制肘。丝茶等出口农业品定价权失落后，国际市场地位趋于不稳定，创汇盈利能力下降。加上国内市场叠床架屋，流通成本高，农业生产者和民族企业均得不到应有的收益。民族工业与农业间的良性循环无法进行，工业难以获得农业品出口的利益而发展壮大，工业发展的迟滞则导致其无力反哺改造农业，使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提高乏力，民族工农业的互动互惠式发展受到极大制约。

20世纪后，随着国内工业的发展，中国有一部分机制工业品出口；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机制工业品出口在数值和品类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海是全国工业中心，除了矿产品外，大多数工业品由上海出口，特别是轻纺工业品大部分由上海制造出口。1913年上海出口轻工业品（不包括棉纱、面粉、丝绸匹头及丝织物）为30.6万关两，占出口总额0.17%，1936年增至919.3万关两，占出口总额3.95%，比1913年增长了22倍⁽²⁸⁾。二三十年代，在民族工商界和南洋华侨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向南洋输出工业品日趋活跃。

一般而言，当进口替代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适时地向出口替代转化，以获取更为广阔的市场，维持工业化的持续性增长。尽管上海出现了工业品出口，但其局限性十分明显：其一，制成品比重甚小，对进出口结构无大影响；其二，出口替代工业品就是进口替代工业品，而且当国内市场疲软时才想到出口国外，作为一种产业导向和发展战略远未形成共识。中国民族工业品在海外市场上的局促，主要在于质量低下、款式不对路、缺乏标准化和市场开拓不足。丝织品、厂丝、棉织品、搪瓷、橡胶等机制品在质量上不如欧美，在价格上不如日本。在双重夹击下，中国工业品的市场空间很小，竞争力十分微弱，无法有效的扩大出口，比进口替代高一层次的出口替代始终不能发展起来，从外部市场积累工业化资本的道路基本走不通。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微弱，成为中国民族工业无法利用国际市场推进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发展民族工业，在外贸这个层次，用竞争的方式还是保护的方式，是个两难的问题。近代上海显然是被迫地接受了竞争的方式。其效应可分前后两个阶段：清末民初，因中国的技术人超，获得了国外的先进生产力，民族工业兴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外货外资大量输入，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国内市场占有率不高，但这种国内竞争国际化的环境也历练了民族工业的坚韧性。

表 3

民国时期上海工业品出口在全国的比重

单位:海关两

工业品 名称	年 份	1919	占全国的 比重 %	1927	占全国的 比重 %	1931	占全国的 比重 %	备注
棉布		2515776	50.7	14922686	92.7	11147992	91.2	
棉纱		2566016	96.2	15758076	79.7	25135599	73.4	
纸、纸板及制品		82547	2.1	373919	6.5	332858	8.4	
机器及其配件电料		23552	39.5	314773	88.1	610256	63	
金属及制品		57394	4.3	1225502	40.6	1362117	34.7	
白厂丝		32744920	61.4	46747430	51.9	25540880	49.3	
烟草		9124538	67.1	17883033	74	5747992	57.3	
化学及药用材料等		1492792	13.7	2919171	30.9	3049131	23.6	包括颜料漆 胶、肥皂、洋 烛、香料、肥 料、炸药。

资料来源:蔡谦、郑友揆编制《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有关资料,白厂丝数值取自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有关资料。

表 4

上海出口南洋地区部分工业品统计

单位:千关两

年份	1928			1929			1930			1931		
工业品名称	化妆品	搪瓷器皿	电灯 电器	化妆品	搪瓷器皿	电灯 电器	化妆品	搪瓷器皿	电灯 电器	化妆品	搪瓷器皿	
香港	54.4	5.2	114.8	32	7.2	199.3	50.7	4	205	49.1	26.6	
安南	—	—	1.4	0.9	0.1	0.1	3.9	—	0.1	2.3	—	
暹罗	0.9	—	0.2	—	0.8	—	1.1	0.3	0.6	3.7	2.6	
新马	33.7	11.7	13.4	55.6	56.2	10.2	71.7	29.8	5.6	87.8	29.2	
何印	10.3	2.4	12.7	7.2	2.6	16	9.2	0.2	10	13.7	8.9	
缅甸	4.9	0.2	1.3	10	2.3	—	6.8	0.1	1	8	0.5	
菲律宾	15.2	4.3	50.2	34.3	16	48.6	35.9	6.5	100	60.1	8.1	
合计	119.4	23.3	194	140	85.2	274.2	179.3	40.9	322.8	224.7	75.9	
上海口岸对其 它国别和地区 出口	2.4	73	103.8	1.9	44.2	148.7	1.2	29.9	85.3	1.7	86	
总计	121.8	96.8	297.8	141.9	129.4	422.9	180.5	70.8	408.1	226.4	161.9	
对南洋、香港 地区出口所 占(%)	98	24.6	65.1	98.7	65.8	64.8	99.3	57.8	79.1	99.2	46.9	

资料来源:民国年间上海日本商工会议编制的历年《上海港出入贸易细表》。

四、近代上海“自由贸易”的历史审视

审视近代上海“自由贸易”的利弊顿挫,不仅考察其贸易本身的得失,更重要看其溢出效应和整体效应如何。以历史的高度,鸟瞰近代“自由贸易”形态的市场化效应及其对近代上海整体经济发展的多元作用,俱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一) 近代上海“自由贸易”的主要利益流向

1. 贸易规模长盛不衰，洋行垄断进出口业务，华商外贸业发展艰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至 20 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对外通商口岸已增辟之 100 余处，汉口、广州等许多原先大港在全国外贸的比值节节跌落，而上海始终保持着全国外贸 40—50% 的规模优势。民国以后，上海外贸发展仍然强劲，绝对值不断提升。1912 年沪地进出口净值 3.68 亿关两，1931 年突破 10 亿大关，达 11.02 亿关两，1933 年上海外贸占世界贸易总值为 1.1%⁽²⁹⁾，超过日本横滨和香港，成为东亚地区外第一港。民国年间，与沪外贸的国别数量亦有所扩大。1912 年，不包括港澳，与沪贸易有 34 个国家和地区，1931 年增至 44 个，遍布世界各大洲，大洋州之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美、东非、北欧等国家都与上海发生了贸易往来，上海对外经济关系的辐射空间进一步扩大。

上海外贸中西洋贸易规模最大，贸易的主要形式是洋行贸易。1936 年上海以进出口贸易为专业的西方洋行有 559 家，占全国洋行总数 919 家的 60.8%。这些洋行分属欧美、中东、印度、苏联等 39 个国家，其中英、美、德、法、瑞、意、荷 7 国洋行占上海洋行的 85.3%⁽³⁰⁾。清末以来，欧美洋行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早期多种经营的综合性洋行渐趋式微，专业性外资贸易行兴起，不少洋行实际上是外国厂商直接在沪设立的专业贸易机构，如专营肥皂的英商中国肥皂公司，专营进口柴油的美孚洋行等，具有很强的业务专业性。此外，随着一些老牌洋行垄断地位的丧失，北欧、东欧、中东国家一些中小商人来沪开展业务，大量专业性的中小洋行兴起。

民国时期，中日贸易发展很快。民初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少日本商人来沪设立商行，此后日商洋行纷纷出现，以前欧美洋行垄断中日贸易的局面不复存在。1936 年上海日商洋行已有 114 户，其中 80% 为中小洋行，专营中日贸易。

按时序先后论，近代上海华商外贸大致可以分为南洋贸易、东洋贸易和西洋贸易三部分。

华商涉足南洋贸易最早，19 世纪中叶华商南洋庄已出现。民国时期，以代理南洋侨商进口业务为主的“九八行”⁽³¹⁾分化，一部分由原来代理变为自营，而一些侨商则直接在沪设庄经营进出口。南洋庄大致有进口海味、洋米、食糖、木材和出口南北货、丝绸匹头、纱布、杂粮等专业；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专营国产轻工制品、日用品出口的南洋庄亦渐成专业。上海南洋贸易值，1912—1936 年间，从 2500 万关两增至 1 亿关两以上，翻了两番，其占上海外贸总值比重，进口约为 8.3—11.1%，出口约为 5.2—14.3%。1936 年上海南洋贸易进口额为 2940 万关两，华商南洋庄及其他华商合计进口占 20.28%，外资洋行占 79.72%，出口至南洋 2299.7 万关两，南洋庄及其他华商合计占 52.93%⁽³²⁾。1937 年，上海各类南洋庄 113 户，在出口方面占有些许优势。

华商东洋庄约起于咸丰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华势力大肆扩张，日本的三井、三菱、大仓、住友等大洋行逐渐控制了中日大宗贸易。大部分华商东洋庄以经营日本海货、杂货为业。1925 年，日本政府特设海产专卖机构，不准华商直接经营日本海产品，海味东洋庄趋于衰落。1931 年“九一八”后，沪地海味东洋庄全部歇业。甲午后，日本积极推销其轻工业品杂货，对于华商百货东洋庄经营予以优惠，华商东洋庄户数增加，贸易亦有扩展。一战后，上海有盈丰泰、东林、同丰源、昶记等 35 家百货东洋庄，经营日产棉毛制品、搪瓷玻璃制品、皮革橡胶制品、皂烛火柴、文具玩物钟表等。1925 年上海从日本输入总额 11378 万关两，日本杂货 691.9 万关两，仅占 6%，其中华商东洋庄进口 612.7 万关两，比重 88.55%⁽³³⁾。由于日货质量不高，且多假冒西洋货牌号，但价格低廉，多销往内地。此后“五卅事件”等抵货运动兴起，东洋庄业主被人视为奸商，上海百货东洋庄一蹶不振，“九一八”后，全行业趋向衰落。

最早的上海华商西洋庄，是 1906 年何积藩开设的“列丰庄”。1920 年上海华商西洋庄有 40 余家，至 1936 年上海已有华商西洋庄 194 户，业主大都来自洋行买办、洋货商人、掮客、洋行职员等，也有一些是来自金融界、实业界和海外华侨的投资者。华商西洋庄在资本实力和对外业务上与洋行相差甚远，经营业务以洋行不经意的次要市场为主，如废棉、草帽、工艺品、花边、古玩等零星杂货，很少大宗商品，营销的市场也往往是洋行不经意的次要市场，以此规避与洋行竞争。民国年间华商西洋庄在

西洋贸易中比重，进口约占 10%，出口稍高约占 10—20%，除了丝茶出口外，大多数华商西洋庄仰人鼻息，在外资洋行的排挤和打压下难有大的作为。

清季民初，华商外贸业渐次兴起引人注目，打破了洋商、洋行的一统天下，改变了上海外贸行业的资本构成。华商贸易业大都为拾遗补缺，中小华商行的兴起使上海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品牌更为丰富，各类外贸交易更为细化。但华商外贸业营业额即比重均不大，无力改变整个外贸结构和贸易条件，其发展空间十分有限。

2. 近代中国外贸的利润流向及经济安全考量

其一，近代中国外贸巨大逆差主要是工业品入超，从而造就了列强工业品输出的巨大利润。

外贸主权丧失，关税低下，进口工业品长驱直入，贸易利润大多为列强所攫取。列强的某种商业特权，造成市场的不平等竞争，大量市场利润向洋商聚集，并流出国外。近代上海是洋货工业品进口大港及最大之转运港，西洋贸易占整个外贸的比重常年在 70%以上，高出全国比重十余个百分点，制成品绝大部分来自英、美、德等少数国家⁽³⁴⁾。民国以降，日本轻纺工业大量输华，同样获利不菲。由于中国外贸条件恶化，列强对华贸易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润。清季，西方某些廉价又方便工业品为中国民众习用，进口量大增。如煤油，1887 进口量为 1200 万加仑，10 年后为每年 1 亿加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每年 2 亿加仑⁽³⁵⁾。此外，洋布、呢绒、人造丝及织物、洋粉、纸张、文具等进口量持续增长。民国年间，一些生产资料进口值增长迅速，化学产品、车辆、电气材料、钢铁五金、机器、安尼林染料等成倍增长。“这六项商品在上海发展速度更快，1913 年上海进口 2769 万关两，到 1931 年增加到 15889 万关两，为 1913 年的 5.7 倍，其中机器、染料、电器材料、钢铁五金等大部分都从上海进口，要占全国进口的 60%—70%⁽³⁶⁾。

其二，外国投资增长，“以谋巨利”

19 世纪 80 年代后，银汇不断下跌，影响用金国列强对远东用银国的出口贸易利润，因远东所得商业利润（白银）汇成金币，十分不利，外商为谋自身利益鼓吹西方恢复本位和提高银价。马关条约后，列强得以在华自由制造，银汇不利因素，顿时变为外资投资的有利因素，列强巨大的贸易利润得到了在华转化为工商业直接投资机会，于是大规模的外资输入兴起。1895 年后，机器设备、钢材、棉花、燃料、中间品等进口显著增加，中国的进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的外资棉纺织业等轻纺工业纷纷设立，上海成为列强直接投资的抢滩之地。“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进口商品的货值不必亟亟以商品出口来抵偿。他们（外商）尽可以利用进口商品售得的资金以作产业投资中的不动产（如土地、房产），以及各种流动资金（如购原料、雇工人）之用。……以进口贸易所得的资金作为投资之用，彼此挹注，以谋巨利”⁽³⁷⁾。外国工业资本的增长速度超过民族资本。“1928 年，上海外资工业资本总额约 2.27 亿元，民族资本总额 1.04 亿元，1936 年，外国资本上升为 4 亿元，民族资本上升为 1.62 亿元，……前者的增长幅度为 76.2%，后者仅 56.7%”⁽³⁸⁾。上海的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和资产比重上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依雷麦氏估计：1930 年列强对上海之投资：英国占其对华投资总额的 76%；美国亦占其 64%；法国占其 40%；日本则占其对中国本部投资总额的 66%。此项情势，今未有若何变化；故列强之对华投资，可谓集中于上海”。⁽³⁹⁾ 外资流入，中国没有选择权，外资在华企业商品大量占据市场，对民族工业产品构成巨大的资本和市场压力。

其三，中国买办的外贸利益

晚清外资洋行大都依靠华人买办、洋货商人推销洋货，收购土货，利用中国既有的流通网络，降低其深入中国城乡直接购销的商业成本，由此洋行不可避免地让渡相当大一部分利润予中国买办。清季沪地买办的佣金一般为每笔货物交易额的 2%，高者可达 5%以上⁽⁴⁰⁾，除了佣金外，还有出口商品差价、薪金等收入。据估计近代中国开埠至甲午战争前（1894 年），中国买办收入高达 5 亿两白银之多⁽⁴¹⁾。

近代中国内地商业贸易领域，交易流通主要仍是传统方式，与欧美资本主义式商务程序并不匹配。一般而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要进入一个新的市场，这个市场的社会文化、商业习俗与西方的差异越大，其进入的制度成本越大。买办这类角色，正是利用这种差异攫取利益。买办制度的实施和发展的过程，也是洋行、外商与买办利益博弈的过程。在这种互相依存的博弈关系中，中国买办似乎略占上风。买办的优势在于他掌握的社会资源多于外商，既是洋行的“伙伴”，又是外商的竞争者。这里透视出中国商人的某种精明，而正是这种“精明”帮助洋货侵占了中国内地市场⁽⁴²⁾。买办须有资本、商业技能、须懂外语，还要有担保，是当时稀缺人才，故其收入甚高，这是西方商人早期打开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成本。买办相当一部分积累后来成为中国工业化初始资本的来源之一。20 世纪后，随着内地市场不断地被开发，中外制度渐次磨合兼容，外商对中国社会及商情的了解，买办中间商制度逐渐分化为经销制、代购制、高级职员制、合伙制等，不少外商直接与华商联手经销商品或采购土货。一战后日本洋行不断增加，因日人大多懂汉语，不设买办。20 世纪后，随着西方列强资本输出扩大，买办制度式微，外贸利润的国内积累率趋于下降。

表 5 甲午战争前买办的收入估计(1840—1894)

项目	收入(千两)	占收入比重 %
洋行买办薪金	88000	17.6
一般商品贸易佣金及其他收益	184000	36.8
出口商品货价差额	84000	16.8
鸦片贸易收入	97000	19.4
外资工厂买办收入	19000	3.8
银行买办收入	6000	1.2
轮船、保险业买办收入	10000	2
经手外债、军火所得收入	12000	2.4
合 计	500000	100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73 页。

其四，洋行等中外贸易商利用汇价牟利

近代外贸，洋行控制了大宗商品的进出口，另一方面，外国洋行利用市场支配权，规避转嫁汇率风险，甚至利用汇率波动牟利。以民族棉纺业为例，华商棉纺业不仅在棉花棉纱进出口受到日本等列强的操纵，在纺织机械的购买方面亦受到洋行的制约和盘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棉纺业赢利颇巨，1918、1919 年华商纱厂大量订购棉纺机械。由于英镑汇率低落洋行竟拖延交货，“以求善价”，导致华商新老纱厂空房待机，耽误生产进程，直到 1921、1922 年才大量到货。“查全国各厂所购机件大半过期不交，镑价又见大跌，再查各洋行情行之惯性于镑价低廉之时则强迫加价，于镑价昂贵之时则将现货售出，以图善价。种种不平，各厂吃亏太甚”⁽⁴³⁾。拖延导致英镑汇率上涨，使华商为进口机器无端支付更多的贷款本币。原在一战中的盈利因机器迟到和汇率变动迅速变为负债，纱厂利润转化为洋行厚利，留给华商纱厂主的是萧条的市场和过剩的产能。由于不少纱厂借贷购机，镑价高昂，还贷额超出预期，企业流动资金顿显紧缺。二十年代初纺织机器进口问题，华商纱厂吃亏甚大，为他们此后长期负债经营生产成本上升埋下了祸根。此外，在中国土货出口方面，洋行等出口商利用农民不知汇价行情，蒙骗牟利，使银汇波动之利尽为中外贸易商，尤其洋行所得⁽⁴⁴⁾。

其五，对外开放的若干经济安全考量

与外贸有关的经济安全：1、粮食安全因外贸危害近代中国、上海粮食安全的情况基本不存在。1932 年前，中国政府实行奖励洋米进口及抑制国米出口之常例，米谷量进口远大于出口。上海时有国内粮食不济之状，“边海之区，人口稠密，附近所产稻米，不足供给，洋米‘近水楼台’乃得‘捷足先登’”⁽⁴⁵⁾；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及上海粮食供给的调节。2、大宗原材料的

安全大宗原材料进出口，利弊参半，如原棉等进口打压华棉，但有利于民族棉纺业。3、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有问题。近代中国无法对资本项目有效管控，金融市场极为动荡。据郑有揆先生研究，中国外贸入超与外商在华投资“不论在总的或分期和分国的对比上，都呈现明显的统一性。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际金融资本还通过对白银的控制和投机，极大地控制并骚扰了中国的国民经济。”⁽⁴⁶⁾法币改革前，中国为银本位国家，黄金、白银自由进出常诱发国内金融动荡，币值波动，金融安全毫无保障。30年代美国收购白银案，导致国内白银大量外流，流动性极其短缺，正常的经济运作和市场交易受窒碍。进入20世纪以后，金银比价的变动遂成为影响中国外贸和经济的重要因素。

近代外贸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状况：西方列强的充分自由和中国无奈的“被自由”。列强不仅获得了贸易自由，还获得了相关的航运、税收、行政、司法、社会管理等权力，其自由贸易达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而中国则在这种“自由贸易”中丧失了相当部分权益。使之外贸处于无法控制，无法选择的局面。这是弱国外贸的可悲状态。一个国家的外贸主权不能旁落，绝不能丢失，包括贸易的制度、程序、管理、分配等方面的管控权力，应由国家主动掌控，由此方能在对外贸易中趋利避害，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这是近代中国“自由贸易”之重要史鉴。

（二）内外贸易一体化的大规模市场构建

明清时期上海城是江南地区南北货物的交汇之地，也是广州、厦门西洋南洋外货广货北运的中转港，传统商业和钱庄业都相当繁荣。开埠前，上海贸易以国内地方贸易为主，直接外贸及外贸转运的量值十分有限；其功用属于国内互通有无的商品流通，其性质为传统社会有限的商品流转。在区域商品流通网络中，上海是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贸易的一个转运集散地。开埠前夕，上海的埠际贸易值、正常外贸值、鸦片走私值据专家估算分别为4840万两、450万两和40万两，总计5330万两；其中埠际贸易比重为89.2%，正常外贸比重仅为9%⁽⁴⁷⁾。

1843年开埠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中最北面的口岸，腹地辽阔，又占据长江黄金水道，原先内地绕道广州进出口的货物直接从上海进出，货物吞吐量和交易量大幅度增长。1851年后上海超越广州为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19世纪80年代后，上海外贸额和埠际贸易额均持续增长。1880年上海进出口总值为9222.5万关两，埠际贸易额为8737.8万关两，至1904年，上海进出口总值达32509.1万关两，埠际贸易总值为33054.9万关两；埠际贸易额超过外贸额，其中洋货进口188万关两，土货进口12797.1万关两，洋货出口14260.9万关两，土货出口5808.9万关两⁽⁴⁸⁾。这些数值是基于江海海关册的统计，尚有相当一部分未经海关出入上海的货物，数值亦十分可观。由于存在不同流通环节，市场的实际交易量要远大于文献统计量。吴承明先生估算：“1870~1910年，运进上海的洋货增加328%，经海关运进上海的土货增加535%，不经海关运进上海的土货与经海关的大体相当；内贸发展快于外贸”⁽⁴⁹⁾。大量不经过海关的直接市场交易，说明了沪地与内地中小客商交易的活跃和商品市场的实质性扩大。

近代上海既是外贸巨埠，也是外贸转运、分配大港，由此构成了上海内外贸易一体化网络。清季沪地与各地埠际贸易已广泛展开，民国时期新辟、增辟商埠遍布全国，并渐形成了与上海的固定贸易关系。近代上海与各地内外贸易一体化流通网络大致可分为三大层次。第一层次是大长三角地区的苏州、宁波、温州、杭州、镇江、芜湖、九江等口岸。这些口岸“密迩沪埠”，水陆交通便利，自身腹地不大而物产丰富，它们受上海外贸和城市经济发展的传动和影响最直接最敏感。这些口岸输入、输往上海的贸易值占它们埠际贸易总值的比重，平均在70%左右⁽⁵⁰⁾，成为上海埠际贸易的核心圈和上海工业品的基本市场。20世纪20—30年代它们与上海的埠际贸易值约为八九千万关两，占沪地埠际贸易总值的15—20%。第二层次是各地大港。主要有东北的大连、华北的天津、胶州、华中的汉口、重庆、华南的广州、汕头等。这些大型商埠主要分布于沿海、沿江地区，航运条件优越，均是各大区域之中心口岸，自有广阔腹地和商品聚散能力，它们与沪地长期的贸易关系构成了上海埠际贸易的结构性主干。1936年上海输往汉口等六口（除了大连外）的贸易值占上海埠际贸易输出总值的60.0%，汉口等六口（除了大连外）输往沪地的贸易值为上海埠际贸易输入总值的58.8%。这些大港的共同特点是自上海输入的比重均大于输出至上海的比重，成为上海洋货和民族工业品在各大区域的集散地。第二层次的各大中心口岸构成上海内贸网络的结纽，赋予上海口岸市场吞吐大半个中国商流、货流的强大功能。第三层次是广大的边远港埠。20世纪30年代，除了上述长三角口岸与各地大港外，还有五六十个商

埠。这些口岸中有些为各地大港覆盖，成为其子口岸，约有 25 个口岸与沪有直接贸易关系，其埠际贸易值在抗战前约占上海埠际贸易总值的 20—24%，也有相当的比重。这部分口岸中约有一半商埠从沪输入的货值占其总输入的 50% 以上。“上海为我国最大通商口岸，全国贸易之大部分，均以此为转运中心，……无论远近各省靡不与本埠商务有密切关系的”^{〔51〕}。这些边远口岸的埠际贸易使上海市场对全国的辐射空间大为扩展。

民国年间，上海在口岸化商品流通体系中属终极市场，对内地城乡市场具有制导效应：1、工业品供应的支配和垄断，2、对内地土货供应、流通的支配和控制，近代中国农产品为买方市场，工业品为卖方市场；3、金融方面的制约，4、价格制导，5、组织制导。

内外贸易一体化的大市场，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生态机能”，有了大市场，才有齐全的工商金融体系，才有高规格的市场标准和高质量的上海产品、上海服务，才有人才集聚，才有高绩效的经济发展，才有经济、文化半壁江山的上海容量和海上气度。

（三）城市经济的有效转型——局部市场经济的兴起

开埠后的上海，贸易自由、金融自由、制造自由的程度很高；尤其金融自由：欧美列强大都在沪设立银行，发行银行券（钞票）自由兑换。直到 1933 年废两改元和 1935 年的法币改革。这三类自由给上海带来了空前的市场化洗礼。近代各地口岸不断增辟，大都没有真正做大做强起来，唯有上海，一城独大。根本原因不在于区域优势，而在于开埠后形成的“经济自由、私法自治”的制度形态。近代上海的经济自由度很高，形成了一定的政策洼地，各种要素自由流动。任何经济竞争最后归于制度竞争，近代上海口岸经济持续升级转型，中国局部（上海）市场经济形态兴起。

条约制度覆盖了部分国家主权，将中国硬生生拽进了国际市场。主动自由贸易与被动的自由贸易在制度安排不尽相同，其自由开放取向的选择权操于主动者、强势者手中。这种“不同”难以制约自由贸易的基本市场化运作，即在市场机制的微观层面，两者的差异并不大。

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近代大规模市场兴起，市场结构和市场制度不断进化，上海先后演化发育生长为全国性的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商业金融中心、民族制造业中心；大量的市场制度，民间自给自足；至民初早期市场经济形态大致确立。在各地商业口岸不断增辟的条件下，上海仍保持着全国近代工商业金融业的 50% 的比重，这是制度竞争的产物，上海的经济优势由规模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列强的“恶”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这个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具体而言，就是被迫开埠后的“自由贸易”，上海商品流通量值、商品种类、流通方式、贸易关系由此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一个近代国家经济市场化有个充分条件，即参与国际贸易，利用世界市场的力量，突破、洗涤国内非市场化的制度、理念等障碍，塑造市场新理性。

“被迫的”“自由贸易”——大规模市场兴起——早期市场经济形态——全国综合性经济中心形成，这是近代上海发展的历史演绎和逻辑进路。这一切的初始原因就是“自由贸易”。一切以超经济强力谋取的优势条件均不能遏制内在的市场机制。无论何种名义的“自由贸易”，只要有实质性的贸易自由，有一个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即市场的扩张和繁荣，而大规模市场发展正是近代经济转型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由于近代“自由贸易”制度及其列强的西式管理使租界地区的交易成本的低下，导致了各式工商、金融、服务业企业的汇集，企业丛集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就业者，人口大量集聚。开埠后沪地人口持续增长，尤其是租界的人口急速上升，上海城市化迅速展开。

对于近代条约制度下，上海市场变革和经济发展的评判，无形中总受制于民族感情和国家主权形态。近代上海外贸是列强强加于中国的“自由贸易”，利弊参半，就经济早期现代化视角而言，正面效应似乎大于负面效应，近代上海，乃至整个中国

的经济还是向上发展的。从国别而言，欧美与中国的贸易经济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尤其是美中贸易，贸易宽度大，互补性强。日中贸易则相反，日本工业品均是与民族工业品的竞争性产品，对民族工业的冲击很大。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主要是正面效应，成为国产工业品的主要海外市场。

近代列强强加于中国的“自由贸易”制度，客观地讲它是一柄双刃剑。长期协定关税的低税率有利于列强商品输出的低成本，也降低了国内华资企业进出口的成本。洋关制度一方面使中国的海关事权失落，一方面由于外人的管理使中国传统的海关体制迅速现代化和规范化。租界制度的负面性自不待言，同时因租界西式资本主义的政法制度及相应的经济、社会自由，屏障了国内专制政府的干预，使其成为中外商业、金融、工业的丛集之地，近代上海之经济重心。最多负面性当属片面最惠国待遇，这凸现了中外经济关系和商务交流中的不平等。近代列强的“自由贸易”是建立在落后国家大量不自由之上的。帝国主义时代的自由贸易与现今国际关系中的自由贸易不可同日而语，但一些市场机理是相似的。市场机制是不可能长期被扭曲，被遮蔽的。除了鸦片贸易、苦力贸易、武装走私外，近代上海大部分贸易还正常的进出口贸易。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是从个体化的自然产品开始的，纯粹的交换不是在同一共同体内部的交换，而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不同共同体的接触点上开始的。它通过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从而使财富完全摆脱了地方的个人的特殊关系。相比一定共同体内的交易，国际交易和世界市场所孕育的市场关系、市场精神更具超然理性；市场经济的劳动间接社会性、市场竞争、市场博弈的属性能得到较充分的张扬。

近代上海的经济优势，由初始的结构优势——中国最早的外贸口岸及其区位优势；至清末民初形成规模优势——辐射大半个中国和数十个国家的内外贸易的网络的形成，上海外贸领先地位持续不衰（始终占 50%左右）；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口岸经济散发羽化，各项交易制度不断构建完备，凝聚为制度优势——中国局部市场经济的形塑；由此近代上海由贸易中心进化为综合性的全国经济中心。

注释：

①清廷规定，外商来华贸易，须在特定的夷馆街区寓歇居住，所需零星什物就近购买，“一切夷人行走概不许越出范围之外，其间闲杂人等，亦不许混行人内”参见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国立编译馆，民国二十二年版，第 137 页。

②《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94 页。

③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附录（1），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712、第 339 页

④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3 页。

⑤《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10-611 页。

⑥《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13 页。

⑦《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2 年第二辑，第 19 页。参见第 18 页，转摘自王垂芳主编《上海洋商史（1843—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年。

⑧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民国上海通志稿》（第一册），第 583 页。

⑨《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91 页。

⑩有关公共租界、法租界的面积，参见《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民国上海通志稿》（第一册），第758、782页。

⑪王垂芳主编《上海洋商史（1843—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7页。

⑫参见“1843—1949年上海洋商企业名录”，王垂芳主编《上海洋商史（1843—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359—457页。

⑬《上海糖业调查》，参见（民国）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辑《工商半月刊·调查》第5卷第17号，1933年9月发行。

⑭1864—1887年间，全国对外贸易是顺差，出超额达26274万关两，每年平均为1094万关两。参见郑有揆《中国近代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17页。

⑮参阅劳尔·普雷维什：《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426页。

⑯参见陈争平：《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条件刍议》，《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1999年出版。

⑰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47页。

⑱王毓霖编《经济统计摘要》，民国二十四年，第10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中心藏。

⑲参见樊卫国：《近代上海进出口贸易在全国中的比重》，《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3期。

⑳《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Second Issue Appendix XXII。

（21）《申报》1884年10月16—17日，《论印度自设器械制造厂》。

（22）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编《上海对外贸易》（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52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中华书局1966年，第436页。

（24）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1页。

（25）近代中国制造业原料占产值的百分比，棉纺织业为88%，其它行业为70—80%，化工业稍低，为55%。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第32页。

（26）徐雪筠等编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第277页。

（27）任建树等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159页。

（2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89页。

-
- (29) 根据 1931、1933 年海关统计与世界贸易值计算。
- (30) 参见季泽晋编《全国进出口商行要览》，1937 年版。
- (31) 国内代理行不自负盈亏，以代理进出口货值的 2%收取佣金，故称九八行。
- (32) 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 389 页，“1936 年上海对南洋（包括香港）进出口贸易华洋比重表”整理计算。
- (33)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 561～562 页。
- (34)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 215 页。
- (35)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 22 页。
- (36)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 194 页。
- (37) 郑友揆：《中国近代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第 146 页。
- (38) 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年，第 176 页。
- (39) 陈真等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卷，三联书店 1958 年，第 407 页。
- (40) 参阅（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0～113 页。
- (41)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73 页。
- (42) 樊卫国《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1870—1941）》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2 页。
- (43) 上海档案馆藏《华商纱厂联合会议事录（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1920、3—1921、7》，卷宗号 S30-1-37。
- (44) 郑有揆：《中国近代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年版，第 9 页。
- (45) 参见张培刚廖丹清：《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39 页。
- (46) 郑有揆：《近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研究》，第 146 页。
- (47) 参阅“开埠前夕上海埠际贸易、对外贸易及鸦片走私贸易值之比较表”，陈正书著《上海通史》（晚清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3 页。
- (48) 埠际贸易的土洋货不一定全是当年进出口的货物。
- (49) 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50) 这些口岸与上海埠际贸易的比重根据韩启桐等编《中国埠际贸易统计》有关资料计算。

(51) 参见《Foreign Trade of China 1930》(Part 1: Report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 民国 22 年上海通商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则处刊印, 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 Page 38。

参考文献:

1. 李鲁 张学良. 上海自贸区制度推广的“梯度对接”战略探讨[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5 (2) .
2. 马特·里德利[英]. 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3. 沈开艳 黄钟等.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4. 刘少杰. 西方经济社会学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5. 张培刚 廖丹清. 二十世纪中国粮食经济[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6. 徐新吾、黄汉民. 上海近代工业史[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7. 吴承明. 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8. 郑有揆. 中国近代对外经济关系研究[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9.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上海对外贸易[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10. 郝延平[美]. 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 东西间的桥梁[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